

← (上接2版)

如果没有参照英文本,不可能发现并纠正这个错误。日文本错译误译的地方,都一一得到纠正。这在过去的研究有不少都被指出来。如方红、王克非《〈共产党宣言〉中日首个全译本比较研究》:

中译本纠正了日译本中个别英文单词的拼写错误(如:生来的长上“Natural Superiors”),尤其保留了英译本中《哲学的贫困》一书的法语译名“Philosophie de la Misere”,但是该书的汉译名《贫困底哲学》明显受到了日译本的影响,尽管没有照搬日译本中的英文书名“Philosophy of Misery”。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,中译本是以日译本为底稿,同时也认真地参考了《宣言》的英译本而译出。

同时参照,美美与共

翻译是个复杂的再创作过程,很难对参照哪个底本作量化估算。“取予时适,去就有方”,在整个翻译过程中,陈望道是同时参照英译本和日译本两个底本的。其实已经有不少学者都阐明了这个立场。如王

东风、李宁的文章说:“陈望道毕竟是一个学者,为了翻译的准确起见,也为了充分利用他精通日语的特点,他在实际翻译时是把英译本和日本翻译家幸德秋水和堺利彦1906年的日译本《共产党宣言》进行对照之后才慎重下笔的。”根据的是哪种底本,参照的是哪种译本,陈望道确实前后说法不一,这并不奇怪。陈望道之子陈振新的表述中也反映了这点矛盾:一是“我父亲跟我讲了,他是根据《共产党宣言》的日文版,再参照英文版来翻译的。”(《有所思—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纵横谈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)又是“到一九二〇年四月底,陈望道主要根据英文版《共产党宣言》,再参考日文版,完成了《共产党宣言》的翻译工作。”(陈振新:《陈望道与翻译〈共产党宣言〉》,载《〈共产党宣言〉汉译纪念版》,中华书局2011年版)不尽一致也很好理解,因为确实很难衡量哪种底本更为重要。

为什么没参照德文本却仍然保证了较高的翻译质量,成为经典名译?这是因为陈望道先生参照的两个底本都是非常优秀的,同时参照,相映生辉,集中了两个译本的长处,做到

了“美美与共”。

陈望道先生翻译所依据的英文底本是1888年由恩格斯指定的赛米尔·穆尔(Samuel Moore, 1838—1912)完成的。穆尔译本的特点是权威性。恩格斯在1867年6月24日致马克思的信中说:“我解决了由谁把你的书译成英文的问题;这就是穆尔。他现在的德文水平能够毫不费劲地阅读海涅的作品,并且会很快地熟悉你的风格(价值形式和术语除外,这我必须大力给以帮助)。”(中央编译局译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第31卷,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)恩格斯指出:“翻译《宣言》是异常困难的……”只有一个人能完成这项任务,“就是赛米尔·穆尔”,他在致弗·阿·左尔格的一封信中还补充说:“他也正在做这件工作。第一节的译稿已经在我这里。”(中央编译局译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第36卷,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)

陈望道所依据的日文本《共产党宣言》由幸德秋水和堺利彦合译。他们两人是日本最早介绍和研究马克思学说的理论家。1904年11月13日,两人在《平民新闻》周刊(第53号)发表了从穆尔的英文本转译的日文《共产党宣言》(第三

章未译)。1906年3月15日,堺利彦在他主编的《社会主义研究》创刊号上作为“学术研究的资料”刊登了《共产党宣言》全译文。当时幸德秋水在美国,由堺利彦以一人之力补译了早先略去未译的《共产党宣言》第三章。这就是陈望道首译所参照的日文底本。

日译本的最大特点是严谨。考虑到《共产党宣言》是世界性经典作品,两人首先是要确保意思的准确传达,因此在字句上较为拘泥,措辞十分严密;在语言风格上,也使用了当时在翻译西方典籍时常采用的汉文训读体,呈现出和经典相称的庄重风格。因为汉文调的风格生硬,和口语脱节,所以幸德秋水后来说《共产党宣言》译文佶屈聱牙,晦涩难懂,连自己都看不下去,认为这次翻译是一次失败。(幸德秋水《翻译の苦心》,《幸德秋水集》,改造社1929年版)但这是他谦虚的说法。实际上,日译本中的精彩之处俯拾皆是,可以见出两位译者当时的深思熟虑。如《共产党宣言》中“Bourgeoisie”一词,日本当时和中国一样,都还没有这个阶级。如果用现成的“中等市民”、“资本家”、“富豪”、“绅商”等译法,都难以确切表达科

学社会主义理论中所谓“Bourgeoisie”之意。幸德秋水和堺利彦合译《共产党宣言》时,经过反复磋商,将其译为“绅士阔”。“绅士”在日语中并不对等于“gentlemen”,其意思是“老爷”,可以代表与工农(日语中称“劳动者”)相对的中产以上阶级。“阔”则和“财阔”“军阀”平行,而且和法语词“Bourgeoisie”中的“oi”音节发音类似,可见是煞费苦心的。其实幸德秋水的大部分作品也都用训读文写成,十分便于中国、朝鲜等东亚国家的读者阅读。

正是因为有这两个优秀底本的互相参照,虽然不是对德文原本的直译,陈望道的《共产党宣言》中文首译本仍然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。自1920年8月出版至今,中文首译本已历经了一个世纪的风雨洗礼,但其思想的光辉、语言的魅力并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减却丝毫。首译本忠实传达了《共产党宣言》的精髓,把本真的马克思主义带到了渴盼社会主义思想的中国,为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、为推动中国革命和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。

(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)

洞庭东山的陆巷古村,是目前江南古建中保存相对完好的一处。之所以颇具遐名,还因为它是王鏊故里。很多人不知王鏊何许人也,但若提起他的门生唐寅(伯虎),恐靡不知晓。唐寅自诩“江南第一才子”,心气高得很,性情也有些癫狂,但对老师王鏊,还是识礼数、知敬畏的。王鏊死时,唐寅在墓前挥泪吟下“海内文章第一,山中宰相无双”的联句(还画过《王鏊出山图》),我以为这个评价,准确而到位,故后人每提王鏊,必加以引用。

去岁孟冬,专程去了一次陆巷村,流连于几处明清老宅、古渡古井。但印象最深的,莫过于铺面接踵、宽石老屋的古街上,那三座分别刻有“解元”“会元”“一品探花”壁龛金字的牌楼,即三元牌坊。王鏊当年在乡试、会试中连夺第一名“解元”和“会元”,但在殿试中并未拔得头筹,这事实无纠结之处。量中国1300多年科举制度,连中三元属于极小概率,仅有如下13人竟得:唐朝的张又新、崔元翰;宋朝的孙何、王曾、宋庠、杨真、王若叟、冯京;金朝的孟宋献;元朝的王崇哲;明朝的商辂;清朝的钱棨和陈继昌。那么,王鏊在连中二元后,又在殿试中取得一甲三名(探花)的成绩,已属全国凤毛麟角的学霸了。可问题出在本已被众考官推为状元的他,很不幸地撞在了主考

王鏊当年不寻常

喻军

官、即明朝唯一连中三元的商辂手里。商辂显然不希望王鏊成为这个“独一份荣耀”的终结者,故把谢迁列为第一,王鏊退为第三。消息一出,时人讽曰“文让王鏊,貌让谢迁”(《制义丛话》卷四)。

赫赫厥声的王鏊,从学者甚多,唐寅、文征明、祝枝山、王宠、陆槩等均曾列其门墙。当然,他们不是向王鏊学书画,而是学制义八股。那么,回读前文所提及的唐寅的那副对联,难免使人产生疑问:以其弟子的站位,称赞老师“海内文章第一”,是否溢美过头?明朝的文章妙手,即便不包括后出王鏊的“后七子”“公安派”“竟陵派”诸大家,光凭弘治、正德年间差不多与王鏊并世的“前七子”及钱福、吴宽等,也可谓峰头林立。俗话说文无第一,岂惟王鏊乎?但客观地讲,在八股文的写作上,最受推崇的大家,正是“制义开山”的王鏊。

八股文产生于儒家文化语境中,是明、清应试经义、科举取士的一种规范文体。凡欲考场求取功名的学子,首要条件就是看八股文水平。王鏊当年文祺佳鬯,辞令之妙,可谓冠绝一时。在他连中二元后,作

为会试考官的谢一夔、郑环皆惊叹其乃大文豪苏轼再世。当时有八股文四大家之说,王鏊也名列(王鏊、唐顺之、瞿景淳、薛应旂)首位。吴敬梓的《儒林外史》第十一回还专门提及王鏊的八股文。《明史·王鏊传》谓其:“年十六,随父读书国子监,诸生争传诵其文。”晚明学者郑鄞在《明文稿汇选》中有言:“举业以文恪(王鏊谥号)为鼻祖。”至于清代,推崇王鏊到了“法至守溪(王鏊字济之,号守溪)而备”之境地。李光地《榕村续语录》中说王鏊“守溪自然算时文第一手。本是一极体贴好讲章,又创出许多法则”,与桐城派大家方苞指王鏊“音调颇与后来科举揣摩之体相近,而意脉自清”的意思相近,皆肯定王鏊不墨守成法,而能自创面目的高妙作品。王阳明在读了王鏊著作《性善论》后,说“王公深造,世未能尽也”,并称其为“完人”。至于古文家俞长城的评价,可谓至论:“制义之有王守溪,犹史之有龙门(司马迁),诗之有少陵,书法之有右军,更百世而莫并者也。”由此可见,唐寅所谓“海内文章第一”者,并非胡捧乱吹。

再看唐寅对联的第二句:“山中

宰相无双”,这是借陶弘景来比附了,我想至少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解读。其一,明朝虽不设宰相,但王鏊乃“真宰辅器”,累官户部尚书、文渊阁大学士,加少傅兼太子太傅。后以武英殿大学士的身份致仕,与宰相地位应属相当。他为人清正刚直,与权倾朝野的宦官刘瑾做过不屈抗争,使得一些被陷害的名臣清流,因王鏊的“前后力救得免”,其中就包括当年无意中夺其状元的谢迁,可见其人品之高洁。其二,陆巷既是王鏊的出仕之地,也是他的归隐之乡。他的归隐,不是仕途上的以退为进,而是坚不仕出。虽有廷臣屡欲举荐,希其复出,均遭王鏊拒绝。《明史》谓其“持正不阿,奉身早退”。其实,辞官对于王鏊而言,可谓出涸辙而纵清流,想必也看淡了朝堂之上,多少秋云世态、流水人情。由于为官清廉,不治生产,故也留得“天下穷阎老”的清名。

王鏊卸篆后,时与文友结伴悠游太湖,登临吴山。或潜心著述,遍访村野遗老,著《震泽编》《姑苏志》等;或结社讲学,培养如唐寅这般的弟子。他也关心朝政,曾为民间疾苦仗义执言。所以唐寅借用南朝梁时隐居茅山、屡聘不出的陶弘景“山中宰相”之名作比,不是很贴切吗?

王鏊在陆巷的故居叫惠和堂,几百年几经兴毁,目下所见,乃标准的古代官宦宅第建筑。其五进

深,纵轴三路,各类设置齐全,符合王鏊的身份,却无豪奢之气。说起来,这座相府还和唐寅有关。所谓“唐伯虎点秋香”的故事发生地华府(宰相府),即以王鏊的惠和堂为原型。显然,当年故事的编排者十分了解二人的师生关系。“三笑”的主要情节是虚构的,不过是把发生在书生陈元超身上的事,附会于苦命才子唐寅的名下,使其因这一桩无端的绯闻,在电影电视剧的推波助澜之下,成为中国民间最具知名度的画家之一。

王鏊葬于东山梁家山,和背山面湖的家乡陆巷相望。苏州城内与之相关的纪念地也有两处,一为学士街,因王鏊晚年于夏驾湖旁筑怡老园而得名。我年轻时常去苏州出差,几乎每次都住宿在学士街上,当时却不知“学士”者,乃王鏊也;还有一处在申衙前(景德路黄鹄坊桥东)的王文恪公(王鏊谥号)祠,原已用作供销仓库,1980年得以重新修葺。

想起陆机《文赋》中的一句话,“观古今于须臾,抚四海于一瞬”。其实,蜚声明史,于今却流水无闻的王鏊,在洞庭的湖山胜处,却始终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存在。有了他,那些斑斓辞章、恢弘腹笥和人格垂范,穿越了文史的跌宕和时节